

辛亥革命时期的苏州市民公社

廖志豪 李茂高

一直未被人们注意的苏州市民公社，是清季出现的一种自发的街路组织。至辛亥革命时期，它已发展成为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城市基层组织。它既是一种政治性的组织，又是带有武装性质的团体。它完全被苏州商人所控制，与商团关系十分密切，其职能范围，开始从事公益事业，后来明显地表现地方自治的倾向。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自治与苏州商务总会的活动联系在一起，而对被封建官绅把持的苏属地方自治筹备处却表现了疏远的关系。尽管筹备处一再抗议，强调苏州市民公社“应属自治公所管辖，”但苏州商务总会丝毫未作让步，它俨然以市民公社的上级机关自居。

苏州市民公社在辛亥革命中曾起过积极作用。在辛亥革命的准备时期，商务总会的主要领导人，积极参与了立宪活动，并将市民公社引向地方自治；辛亥革命爆发后，商务总会的主要成员以及不少基层市民公社组织积极投入苏州辛亥年的和平光复活动。在江浙联军攻打南京期间，它又承担了地方治安的重任，有力地支援了南京前线的战斗。苏州市民公社的产生、活动尤其是在辛亥革命中所发生的作用值得重视，应当加以研究。

一、苏州市民公社是伴随苏州商团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

苏州在清代是江苏省会所在地，统治全省的江苏巡抚衙门即设立在这里。

苏州地处东南，为著名的财富之区，向为统治阶级盘剥的要地。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的魔爪伸进了苏州。此后，苏州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剥削与压迫下，过着异常痛苦的生活。苏州这座历史悠久的美丽的城市，变成了帝国主义冒险家的乐园。

一八九五年中日战争以后，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依照条约规定，苏州被辟为通商口岸之一。从此，苏州进一步遭到帝国主义肆无忌惮的侵略。日、英、美等国先后建立租界，它们在租界开设工厂、设立公司，并在水陆要道设置关卡。在中国领土上，强行检查中国人来往的船只，强迫中国人交纳牌照税、港口税，甚至强迫民船交纳人头税，租界成为地地道道的殖民地了。

一九〇五年开展的抵制美货运动，是中国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歧视、迫害华工的反帝爱国运动。运动从上海开始，苏州人民立即响应，并迅速形成了一个广泛的群众性的反美爱国运动。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仅苏州的工商界及制衣、漆匠、洋广货等行业即举行了三十多次

集会，参加的人数多达几万人。

在反美爱国运动中，苏州各届人民纷纷建立了自己的团体，学生组织了学生会，教育工作者组织了教育会，商人组织了商会，市民组织了市民公社。团体建立后，公开宣布“广开会议，联络全国，可为异日自治会之基”，从而进一步推动了群众性的民主运动向前发展。

苏州的手工业、商业、金融业发达较早，辛亥革命前，纱缎、刺绣、珠宝、茶叶、枪烟、银钱等几个行业更加兴盛，中小资产阶级力量随之增加，他们为着保障本阶级本阶层的利益在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发起成立了苏州总商会，后经清廷主管机关批准，公开活动。

苏州总商会成立后，纱缎业首先创立学堂——初等实业学堂，令其子弟入学，但学生的父兄及其他同业都感有另设体育的必要，并籍此可以组织商团，成为商人自卫力量。因此纱业代表杭祖良和邹宗淇等唤起各业商人共同来练习体操，于是借云锦公所为办事处，初等学堂操场为操练地址，并由该校校长聘陆军教练官魏旭东为教习，初练柔软体操继续兵式体操，定名为苏商体育会，并于次年八月间由苏商侃开鼎等公拟章程十六条，联名呈报总商会，由总商会转呈清廷商部监督抚立案，并声明如办有成效即作为商团的先声，当由部省照准，并饰地方官妥为保护。体育会练习枪操所需枪枝即由督抚饰由军装局拨付苏商体育会给领。至第二年（一九〇六年），工商界组织的苏商体育会会址设在阊门东中市钱业公所，由苏州商务总会负责人尤鼎孚主其事，征集在东西中市及观前街一带的各商店店员和青年人为会员利用业余时间练习体操锻炼身体以谋进一步作为地方自卫力量。教练由草桥中学体育教员魏旭东当任。会员不满百人。苏商体育会成立后，由商务总会呈请由巡抚衙门咨部立案。其时，苏城吸鸦片烟者甚众，全城共有供人吸烟的大小鸦片烟馆三百多家，至一九〇七年，清政府厉行禁烟勒令闭歇全城烟馆，在执行过程中苏商体育会代巡警局命令烟馆停闭，为地方服务起了积极作用。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战胜了俄国，立宪派乘机大造立宪舆论。他们认为日本之所以能战胜俄国，其基本原因是由于日本君主立宪，俄国封建专制，因此，请求清政府也实行立宪。清政府鉴于当时政治危机异常严重，义和团被镇压后，清军队腐朽溃散，失掉了战斗力。人民群众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风起云涌，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也把武装起义提到议事日程上，为了抵制革命，清政府决定“预备立宪”。颁布了结社集会律，规定了自治范围。此律公布以后，自治呼声日高，自治团体陆续产生。该年，在苏州地区成立了江苏省地方自治筹备办事处。在这期间，以地区为单位的中小资产阶级的群众组织——“市民公社”在预备自治的名义下陆续成立了。

二、苏州市民公社的组织活动及其作用

苏州市民公社中最早成立的是观前公社，于清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五月）成立于阊门下塘东段。其次是桃坞公社，成立于清宣统二年八月，渡僧桥四隅公社成立清宣统二年九月，胥门道着公社成立于清宣统二年十一月。继之、临平、临南、胥江、齐溪、娄江、护北、城南、胥盘、昌门、虎丘等十几个市民公社在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相继成立。有关苏州市各市民公社成立的日期、主管人员列表附在文后。

苏州市民公社的宗旨是在预备自治的范围内，调解民事，举办保安、消防、卫生、建筑及其他公益事业。这些任务在市民公社的章程中都作了具体规定：（一）关于卫生如清洁道路扫除污秽等事；（二）关于道路如修缮街道，疏通沟渠，添置路灯等事；（三）关于治安和

联合救火会，研究消防等事。有的公社如齐溪公社章程还增加了学务和善举等内容。每个市民公社的地域范围犹如后来的乡镇。都绘制了区域详图，呈报县衙备案。

加入市民公社的条件：凡年满二十周岁（有的公社规定二十一岁以上，初期有的公社规定年满二十五岁），在本地区居住一年以上，客籍要居住二年以上，在本地区有商业行为或有不不动产者。但对有不良嗜好或在商业和银钱往来上有失去信用者以及患疯癫者一律拒绝接纳。入社费各社不一。约是五角至三元不等。经常费为二角至一元不等。凡对于犯刑律，违背公社宗旨，破坏公社名誉者，或不依章交纳社费者即令出社。

市民公社的内部组织大致相同，最典型的当推观前大街市民公社。该公社分设干事部、评议部、书记部、经济部、庶务部、卫生部。机构完备而庞大。市民公社的负责人称为社长，设正副职。编制最大的市民公社评议部设议员三十二人，一般的公社也有十多人，干事二十人左右。每个公社设有名誉董事，大多是当时苏总商会的总理、协理和会董。总干事、副干事、评议员经全体社员公举产生，以一年为期。年满公举，连举可连任。名誉董事不拘名额，公举本城公正绅士参加。所以，市民公社和各同业公所成为当时苏州中小资产阶级的纵横组织，而苏州总商会不仅是同业公所，而且也是市民公社的上级组织。

苏州市民公社除本身设有庞大的自治行政组织外，并建立了自己的武装组织。

苏州市民公社的社长，一般都是由有名望的商店资方担任。例如观前市民公社社长施炳卿是怡和祥洋货店的老板，蒋仲君是振源水绸缎店老板。评议员也是由大商店资方担任。评议员侃咏棠是侃源源珠宝店老板，评议员陈吟梅是华章衣庄老板，汪渊如是豫康钱庄老板，周静澜是晋福银楼老板。该社的基本会员皆观前街大商店资方，如杨洪元珠货店、福泰当恒丰祥洋货店、沈同兴铜锡店、恒孚银楼、宏孚银楼、同和原珠宝、中英药房、西兴盛烟业、月中桂香粉、乾泰祥绸缎店，瑞松堂纸业等等资方都参加了观前街公社，成为该公社的基本成员。

苏州各市民公社建立后，为社会做了不少有益的事。例如娄江市民公社筹办了平价饭店。该公社鉴于当时米珠薪桂，贫民终日所得难求一饱，故募捐建立平价饭店，救济贫民。碗比一般饭店放宽容量，价格低一半，另备菜汤不取分文。只准堂吃，不准带回。每碗饭价铜元二枚。平价饭店设在娄门外大街。营业时间上午十时至十二时，晚上六时至八时。试办二个月，社会反响良好。再如观前市民公社筹钱添置救火设备，疏浚区内各处河道，仅民国二至三年就用去了钱壹千零拾柒元陆角。金阊下塘东段市民公社修理了宝苏局大码头以及道路、渡僧桥四隅市民公社修理了阊门吊桥等公益事业，获得了苏州市民的好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州市民公社和商团在辛亥苏州和平光复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夕，由于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江苏地区的积极活动以及全国革命形势的有力促进，苏州城内反清情绪十分高涨，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的钟声震撼中华。消息传到苏州，苏州人民立刻群情激愤，沸腾了起来。但资产阶级非常软弱，不敢大胆领导革命，将反帝反封建的力量有机组织起来，对封建主义和清朝反动统治进行冲击。因此，立宪派张謇等人大肆活动，企图把革命纳入“君主立宪”的轨道。开始，张謇与清江苏巡抚程德全进行策划。在苏州代议奏章，怂恿清廷立宪，阴谋抵制革命。武昌起义后，程德全在革命洪流冲击下，面对清政府土崩瓦解，江苏起义迫在眉睫。他既不逃跑，也不顽抗，一方面与北京清廷电报往来保持联系；另一方面又和上海的革命党人暗中接触，进行试探。资产阶级革命派由于具有软弱性与妥协性，害怕工农力量，企图与开明官绅合作，实现和平光复。苏州总商会的张一麐、潘祖谦积极奔走于革命派与程德全之间，力主和平光

复，以保持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上海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获悉程德全准备投诚光复，喜出望外。他们希望苏州和平光复后，集中兵力直捣南京。因此，黄炎培、沈恩孚、朱叔源、毛侄畴、史量才、龚子英等一般息楼（息楼是教育界工商界聚会之所，设在上海望平街时报馆楼上）和江苏教育总会分子（江苏教育会设在上海西门林荫路）也到苏州敦促程德全，希望他当机立断，宣告独立。

十一月三日，上海光复的消息传到苏州，当时的东吴大学、苏州工专和桃坞中学等大中学校的学生纷起响应。这时，上海军政府也派出数十人来苏州联络光复之事。他们与早已潜伏在苏州阊门、胥门一带的革命党人计议，准备先运动驻枫桥军营，将起义的宗旨向士兵们说明后，士兵们立即起义了。程德全迫于形势，不得不在十一月五日宣布独立。可见，苏州和平光复是在上海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筹划和新军反正的情形下实现的，其间苏州总商会也起了积极作用。程德全接受独立，举义反正，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应该加以肯定。

苏州光复时，与市民公社有密切关系的苏商体育会各支部会员全体出动，昼夜梭巡，市民赖以安堵。后来，由于会攻南京之需，驻军全部开赴前线，地方防务空虚，谣言纷起，苏商体育会会员又协同地方警务机关维持地方治安，深受群众欢迎。后来，由于苏商体育会不断扩大，会员日众，因此，在辛亥元年正月十五日恭祝民国大总统履任及补祝贺新年时，共同议定是日改名为商团公会，即苏州商团。后取得江苏政府同意，并添购了枪枝，扩充了团员在城乡各区先后成立了三十三个支部，计团员一千余人，绝大部分成员是尽义务的，仅少数是雇用的团丁。三十三个支部中十八个是城区支部，大都与市民公社救火会设在一起。胥门体育会支部是一典型。会所设在胥门外震生裕木行，公推刘敬襄为部长，团员共五十名，后改为第五支部，操练场设在苏州皇亭头新关空地。

苏州商团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当局训练团员，维系地方治安。辛亥革命时期，由苏州商团训练的武装体育会会员，经上海民政总长，苏商会董事等校阅合格，得到承认。一九一一年又规定体操会员入伍三年期满准予退伍，并发给证明。因为商团在辛亥苏州和平光复中立了功，所以获得了中华民国江苏都督府的嘉奖，苏州民政长特制铜质奖牌六百余枚奖给商团所属各支部。

苏州和平光复后，苏州商团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由商团公会会长潘祖谦、沈辉、邹宗淇出面呈请江苏都督程德全支持商团扩充武装力量。在程德全的批准下，先拨给快枪三百支，子弹一万颗，后又拨给林明敦中针枪一百二十杆，子弹一千二百颗。苏州商团装备扩充后，对维持社会治安所发生的作用更大，但也应该指出，它在配合江苏都督程德全镇压工农群众的反抗，如镇压唯亭镇农民抗租，镇压田溪小镇的饥民暴动等等方面的反作用也随之增加了。总之，苏州商团在辛亥革命时期表现了它的两重性：一方面，积极支持和参与江苏光复，表现它的进步性；另一方面，追随程德全镇压工农群众运动，表现它的局限性。苏州商团的两重性其实质是商业资产阶级性格的体现。市民公社情形稍有所不同，因其主要活动是经营有关公益与福利事业，他与当局的政治关系并不密切。它存在的时期并不长，从清末（一九〇九年）至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前后约二十年。民国十七年，苏州市政府成立，以城乡内外公益事业统归市政府办理的名义，取消了苏州各市民公社，其实，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北伐军抵苏州时，各市民公社已一律停办了。苏州市民公社生存的日子虽然仅二十几年，但它为苏州市民办了不少有益的事情，至今在苏州人民中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苏州市民公社在苏州辛亥革命的历史上写下了不可缺少的一页，对它进行研究是完全必要的。